

# 從衝突理論觀點看博物館場域的權力競爭現象

原 來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兼任講師

## 摘 要

本文透過社會學衝突理論與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Field)觀點，將博物館場域與文化資本之間的競爭關係清楚解剖，並且逐一解開博物館的各項衝突點，如空間展示塑造的權力衝突、文化與性別詮釋的衝突、展覽品來源合法性的衝突等，說明博物館這個合法的文化霸權之真實情況，也凸顯了博物館本身的脆弱性，讓讀者清楚了解披上文化外衣的博物館，其實是一個暗藏文化矛盾的場域，也是社會文化矛盾的投影，本文冀望透過衝突論的解剖，能夠激發讀者思索一個雙贏的策略，使博物館的運作更貼近社會大眾的需求。

**關鍵詞：**博物館、衝突理論、場域、文化資本。



## 壹、前言

站在博物館大門前面，走進大廳內去欣賞珍藏文物，在玻璃櫥櫃內的各地文物被靜靜地安置在這裡，它們代表了什麼含意？它們是怎麼進來這個博物館的？在眾多的收藏品當中，為什麼挑選它們展出？再深層一點思考，博物館可以說是公共財，是該地區的文化指標，那麼是誰具有決定文物展出的權力，是社會大眾票選或授權這些掌權者嗎？具有決策權的人是依據哪些理論或觀念做出文物展出的判斷？

博物館其實是暗藏文化矛盾的場域，參觀的觀眾是大眾文化的個體代表，但是展覽品卻是菁英文化的表徵，博物館是兩種文化深層對抗，也是社會文化矛盾的投影，「控制一個博物館的精確意義，就在於控制一個社群和它最高的價值和真理的再現。它同時也是界定一個個體在此社群和它最高的價值和真理的再現。它同時也是界定一個個體在此社群中相對位置的權力。群體中最適合表演儀式的人——最能夠對各種暗示做出恰當反應的人——同時也是博物館儀式最完全確認他們(社會、性別、種族等)地位的人。正因為這個原因，博物館和它所進行的活動，可以成為劇烈衝突和激情論辯的對象。在美術館中，我們所見和不見——以及在誰的權威和何種規則下的見與不見——是緊密地連結著社群是由些什麼人組成，以及誰界定它的地位等較大問題的」。<sup>1</sup>

「文化權與政治權的分際是一個相當弔詭的問題，當藝術家的作品不見容於政治品味，政治力的干預並不一定能在文化界取得共鳴。就像二〇〇〇年，當時的美國紐約市長朱里安尼認為英國的青年藝術家以大象糞便裝飾聖瑪利亞的作品有污衊宗教之嫌，直斥變態，而強行以政治力干預展覽，並以大肆削減展出單位布魯克林美術館的經費做為手段，但是，此舉卻在法庭遭到敗訴的命運。」

<sup>1</sup> Duncan, Carol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遠流，台北市，第 19 頁(1998)。

為了看唐摹本《女史箴圖》要遠渡重洋到大英博物館，希臘每一年都向英國追索埃爾金石雕必須歸還，除了這些文物歸還的問題以外，台灣近年產生「超級特展」的觀眾風潮，卻也凸顯了文化霸權更為深化，文化詮釋權不僅限於政府機關，現在大眾媒體也接手操控，媒體以其傳播影響力策劃西方藝術名家展覽，解釋西方藝術對於人類文化的價值，在當地的人文環境形成了不公平的傳播環境，本來是「第四權」的媒體，竟也投入「超級大展」的文化詮釋霸權之林，這會不會形成大眾認知文化趨於更為弱勢的不平等地位？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似乎博物館、美術館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也深陷在「社會結構不平等」的衝突場域之中，無論是不同文化之間、統治與被統治者、菁英份子與社會大眾、甚至男性與女性，因為爭奪博物館場域的主導權或詮釋權而產生不平等地位，甚至發生衝突，導致該場域的權威和權力的再分配，而獲得暫時的穩定和諧。

博物館，這個人類文明創造的產物，一出生就註定是糾紛不斷，為了解釋這種各股勢力拉鋸的現象，本文即以衝突論及布迪厄的場域與資本論點切入，序列展開每一種衝突形態，冀望能藉這些衝突現象的展現，能夠促使相關人士正視這些問題，而積極謀求「雙贏」之解決策略。

## 貳、社會不平等之衝突論與場域競爭分析

在社會學的範疇裡，最早嘗試對不平等現象分析的學者，應以法國盧梭(J. J. Rousseau)、密勒(John Millar)、和蘇格蘭的佛格森(Adam Ferguson)為先驅，他們都同意人類之間的「自然狀態」原本是平等的假設，而私有財產的出現就是社會不平等之肇始，其間盧梭視私有財產為一種負面、壓迫性和破壞性的社會創新，而密勒與佛格森則視為是人類文

<sup>2</sup> 曾肅良，「文化霸權與政治權利交錯的博物館政策」，美育雙月刊，第一三三期，第 47 頁(2003)。



明與社會組織的一大進步，因為人類可以對財富與名望展開追求，從而形成個人所得與聲望的差異。其後，馬克思(Karl Marx)以社會財產關係的觀點討論不平等問題，他以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形式和無所有權的勞工形式，形成了主要的社會團體—社會階級(Social class)，這些階級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利益經常相互衝突，而階級之間的鬥爭(Struggles)遂成為政治活動的主要工具。即至韋伯(Max Weber)再指出市場位置(market position)類似的團體，因為基於階級利益的共通性，而會採取集體的行動；因為他指出榮譽、聲望、地位等也是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形態，這就形成了地位團體(status groups)，他們有屬於自己的行為模式、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和其他團體不同，相對地每一個地位團體也都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這個地位團體或個人可以將其意志加諸於他人，而他人並無法反抗，這就是權力的展現；而一群人為了爭取、維持或發揮其社會權力，就會演變成黨派操作。在社會上因為生產工具與所有權的因素，造成了資本家與勞工的階級不平等；若因為職業、資產與所得、出身、教育、儀容與談吐、住處、親屬關係等各種因素，而產生了不同的社會估計(social estimation)或聲望，這就形成了地位不平等(status inequality)，這些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即有不同的切入角度。

以功能論解釋社會不平等與勞工分工之間的系統性關聯之主要倡導者為美國社會學者派森思(Talcott Parsons)、戴維斯(Kingsley Davis)、摩爾(Wilbert E. Moore)，派森思將有等級的社會分化與不平等視為社會中價值共識(Value consensus)，功能論者認為在各個社會裡都有不同的社會位置，這些位置的重要性不同，令人感覺愉悅的程度也不同，然而這些位置都需要有人擔任。這個觀點是政府當局掌握權力的人最喜愛的說法，因為他們可以據以教育民眾安於其位，功能論者很顯然忽略了不平等對社會的負面或分裂的影響，並且對於造成各個社會位置的不平等程度與確實意義等交代不清楚。當然，功能論者也有他們的貢獻，他們也澄清

了一些觀點：<sup>3</sup>

1. 社會角色或位置的分化以及勞力分工本身的意義。
2. 勞力分工中各角色或各社會位置不平等的報酬分配。
3. 不同角色或位置的配置方式，或是決定取得角色機會的原則、慣例與規範。

以衝突論解釋社會不平等始於密爾斯(C. Wright Mills)和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他們認為不平等源於社會中的個人與次團體為了爭奪供給不足的財貨、享受、特權與報酬，其間優勢團體與個人利用權力與強制(coercion)獲得他們想要的，同時阻止居於劣勢者獲得各個資源。權力和權威是稀有的資產，中國歷代權力的傾軋，就是權力資源太少，很多人為了想要獲得權力即罔顧道德制約；所以持有權力或權威的人的利益在於維持現狀，而未能擁有它們的人則希望重新分配這些資產，這些人的利益就是改變現狀。在人類社會裡面就形成了各種潛在的衝突團體，達倫多夫稱為「準團體」(quasi-groups)。

衝突團體涵蓋廣泛，如政治黨派、工會、商業與工業團體、宗教、種族、民族等，更如幫派、犯罪組織亦屬之，而有組織的消費者團體也可視為衝突團體；衝突團體為了爭奪財產、特權、影響力，為了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會發展出意識形態和精密的組織結構，其衝突就含在完全制度化的形式中，例如選舉、利用與操作大眾媒體、罷工及談判、訴訟等，也可以產生於制度之外，諸如犯罪、戰爭及暴力等行為。

「在達倫多夫手上，生物與社會體系之間的比喻，以及社會體系的觀念本身，都已經被一種「強制統合起來的體系」(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system)的概念取代了……這意指任何有權威存在的組織(實際上，一切組織都是這種組合)，而權威(或權力)的存在本身即創造了產生衝突的條件。」

<sup>3</sup> 傑達·馬特拉斯著，李明譯，社會不平等、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桂冠圖書，台北市，第31頁(1990)。



<sup>4</sup>所以，衝突論者認為社會的支配性價值是由能夠把握或操縱其權力的策略性位置的個人與團體所設定，社會中權力的分配，決定了角色與位置，以及分配報酬與資源。

這個不平等的角色、位置的相對性說法，可以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說明，他用場域(field)來表述行動者在社會的活動空間，是行動者動用資源、爭取利益、展開鬥爭的所在。在布迪厄的概念裡，場域是由不同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所決定的位置(positions)之間，彼此的客觀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和建構。由於場域並非靜止不動的結構，在不同位置上，行動主體會相互爭奪以獲取、積累或壟斷不同形式的資本(物質、服務、知識、身份、地位等)，造成權力的流動和秩序的變遷。當人們相互爭奪各種有價值資本時，包括爭奪規定有價值資本的合法性，資本也就形成了權力的社會關係。因此，布迪厄把場域看成是人們爭奪有價值資源或不同形式資本的場所。

布迪厄利用場域的概念去進行社會研究，得出三種結論。第一，必須理解每一個社會場域與權力場域(政治)之間的關係，蓋後者為全社會的支配力量，是安排社會上各種場域上下尊卑的指揮系統。第二，在所研究的場域裡，應該找出該場域結構，亦即各個社會據點的安排圖樣，以及各據點之間的關係，俾能顯示該場域的資源分配情況。第三，場域中佔據者(行動者)之習性宜加以分析，俾理解他們如何動用場域的資源與機會，以及受到場域結構的束縛與限制，而從事鬥爭的方式與追求勝利的策略。<sup>5</sup>

布迪厄在《論電視》中提到，「場域」乃是由各種社會地位和職務所建構出來的空間，其性質決定於這些空間之中各人所佔據的社會地位和職務。不同的地位和職務，會使建立於職務佔有者之

間的關係，呈現不同的網路體系，因而也使各種場域的性質有所區別。因此場域不能被化約為孤立行動主體的單純聚合，或只是並列元素的總合，像磁場一樣，它是權力軌道所構成的系統。<sup>6</sup>

場域有各種類型和結構，圍繞不同類型資本的分配和爭奪，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場域。不同行動主體其資本的差別其實也是權力關係的形成，因為它決定了宰制及被宰制的位置分配，也影響著行動主體進一步爭取利益的機會。因此，場域不論大小、類別，其間總有尊卑、高下、優劣的系列區分，也因此，場域的不同位置間總是存在著宰制及被宰制的關係。這也就是衝突論的實際運作應證，因為私有財產制度所產生的社會不平等，隨之形成地位團體的權力和利益的維護，以及受制約團體的反抗與爭取，這些現象也可以視為場域的爭奪，每個人在其所屬的場域也在進行爭鬥，爭一個發言權和決定權。

### 參、博物館場域和文化資本的關係

博物館，這個由人類歷經生存的演變與經驗所創造出來的場域，表面上是蒐集一些文物供給他人觀賞，看似一個體驗美感經驗的場所，其實是一個複雜的政經文化衝突的戰場，要說明這個「鬥爭激烈」場域，筆者先以布迪厄的文化資本觀點切入博物館場域，期望能有突破性觀點產生。

布迪厄指出，博物館藉由客觀化狀態的文化資本(如文物或藝術品)的轉化，標示的是相對於日常生活世界的經驗(如神聖相對於世俗)，建構的是不准觸摸、肅穆莊嚴、精雕細琢、堂皇聖潔的氛圍，給予民眾的是「光榮過去」的紀念神聖物，提醒民眾的是受歡迎或者被排斥的階級區分經驗，文化與藝術的神話創造，滿足的是促成社會制度本身神聖

<sup>4</sup> 伊安·克萊伯著，廖立文譯，當代社會理論，桂冠圖書，台北市，第93頁(1986)。

<sup>5</sup> 洪鑣德，社會學說與政治論—當代尖端思想之介紹，揚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市(2000)。摘錄自沈游振，「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哲學與文化，第三十卷，第十一期，第102頁(2003)。

<sup>6</sup> Bourdieu, Pierre & Acquaint, L. J. D. 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麥田出版社，北京(1997)。摘錄自沈游振，「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哲學與文化，第三十卷，第十一期，第102-103頁(2003)。



化的重要功能<sup>7</sup>

這是社會各階級或地位團體所欲塑造「專屬他們的行為模式、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的實行手段，而社會上的各個存在空間，布迪厄進一步劃分為四大類：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是指由生產的不同因素(如土地、工廠、勞動、貨幣等)、經濟財產與收入，以及各種經濟利益所組成。社會資本意謂藉助於所佔據的持續之社會關係網絡而擁有的資源或財富，這些社會資本的容量，取決於他們實際上能動員這些關係網絡的幅度，也決定於他所聯繫每個成員所持有的各種資本的總容量。而所謂的象徵資本，是像禮儀活動、聲譽或威信等資本的累積，這些象徵性資本有助於加強信譽或可信度的影響力。

最後，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一起，用以構成一切區分社會的兩大基本原則，「在文化資本的分配的再生產中，因而也在社會領域的結構的再生產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教育制度，變成爲爭奪統治地位的壟斷的鬥爭中的關鍵環節。」<sup>8</sup>文化資本可用以分析社會不同階級受教育機會與就業的不平等性，文化資本也形塑了菁英團體的正當性，布迪厄的文化資本觀念比馬克思更清楚地界定了社會不平等的脈絡與關係。

「文化資本可以採取三種形式：被歸併化的形式、客觀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被歸併化的形式指的是在人體內長期地和穩定地內化，成爲一種稟性和才能，構成爲生存底—又稱作主體化的形態，指身體精神或身體的一種長期的習性。客觀化的形式指的是物化或對象化爲文化財產，例如有一定價值的油畫等。制度化的形式指的是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確認各種學術、學位等。」<sup>9</sup>

布迪厄的文化資本觀念開啓了我們一些對社

會階級的看法，馬克思的階級觀念建構在生產工具擁有之經濟資本的基礎上，但是在社會的資本結構上常有不同的資本做流動與轉換，例如富人階級可以利用經濟資本投資他們的子女，獲得學術資格之文化資本；而擁有一定藝術價值油畫的收藏家，也可以利用這些文化資本擴大他的社會資本，因社會資源網絡的實力豐厚，或可爭取到更多的經濟資本。社會階級的形成與繁衍，就是在這些複雜多元的資本形式交互構成的。

從布迪厄的觀點可以了解，階級的構成並不只有權力分配或生產工具擁有與否而已，階級必須和習性合而爲一，因爲習性(或處事態度)直接控制人們行爲，所以同一階級的人意謂著是一群共同習性或處事態度，和共同生存條件的個人群體，所以階級也可以從行爲上鑑別。

固定參訪博物館的觀眾族群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與階級，尤其是美術館(藝術類博物館)觀眾爲典型代表，「布迪厄在一九六〇年代進行以法國爲主的歐洲美術館觀眾調查，實證其關於文化消費與階級關係的理論。他認爲參觀博物館/美術館是屬於菁英式的文化活動或消費行爲，選擇欣賞所謂的「精緻藝術」，就如同去聽音樂會、上劇院一般，以上層階級/宰制階級居多。而且，不論職業類別、社經地位、教育程度或休閒時間的支配而言，他們都是優勢者。」<sup>10</sup>可知博物館過去曾經是菁英分子的「聚會場所」，目前博物館的經營朝向服務更廣大多元的觀眾群，這可說是多年來不斷地折衝調適過程中所獲得的成果。

「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分配結構是對稱且對比的」<sup>11</sup>，同一階級裡具有同一性、一致性的傾向，這產生了階級和階級之間生活型態的差異性。博物館的場域設計亦然，擁有博物館文化資本的「地位團體」形塑了他們認爲的文化場域，博物館的展覽是擁有特權的人的舞台，他們具有詮釋權力，展示他們認爲的自我與「他者」的意象；換言

<sup>7</sup> 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桂冠圖書，台北市(2002)。

<sup>8</sup> 沈游振，「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哲學與文化，第三十卷，第十一期，第104頁(2003)。

<sup>9</sup> 高宣揚，「論布爾迪厄社會學中關於『象徵性實踐』的概念」，中山學術論叢，第十三期，第41-42頁(1995)。

<sup>10</sup> 許功明編譯，「美術館觀眾的社會學調查與分析」，博物館學季刊，第九卷，第一期，第67頁(1995)。

<sup>11</sup> 同註8，第108頁。



之，他們藉由「他者」的建構，使自我的存在與傳承合理化。

「博物館作為文化與社會機構，如何論述展示，透過實際空間體現，成為凝聚文化或政治認同的關鍵角色；博物館蒐集物件、篩選題材、將不可見的論述化為可見的展示，在過程中掌握了篩選與決定的權力，這使得博物館不僅僅成為文化腳本的獨白場域，更成為知識權威的化身。換言之，博物館與其空間性支配了知識權力，定義了公眾對於意識形態、信念體系，乃至『事實』的想像。誠如法國哲學家傅科所言，知識的手段與權力的策略是一種共生結構，權力的合法性奠基於知識並且利用知識。另一方面，權力藉由不斷編修知識、再複製知識，使得知識系統更符合權力菁英的意識形態。於是，在此過程中，博物館特別是指公立博物館成為權力鍛造知識的空間，它們既是知識的仲裁者與詮釋者，亦是定義並強化文化霸權的場域。」<sup>12</sup>

博物館既然是擁有經濟和文化資本的人可以發揮的場域，也是形塑階級意義的舞台之一，博物館也自然地成為其他階層爭奪的場域，無論是空間、文化詮釋權、性別等各個領域，都有地位團體的衝突戲碼上演，這個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場域，雖然其定位仍然不明，但是場域衝突史已經很精彩了。

## 肆、博物館場域衝突問題

翻開城市的文化地圖，博物館、美術館總是擁有一種「靜謐的吸引力」，很容易成為該城市的文化地標，這個靜態的建築物及展覽文物，卻不斷上演了動態的激情戲碼，這是博物館的宿命嗎？本章先舉出三種常見的衝突形態—空間場域、詮釋權力和文化與合法性，論述博物館面臨的衝突問題。

### 一、空間場域衝突

空間是最容易產生衝突的場域，因為它顯而易見，因私人財產所隔離的空間具有排他性，也最具

有階級表徵；博物館的空間場域，可以從貴族與大眾的衝突切入。

十八世紀，歐洲的王公貴族將他們的收藏品掛置在裝飾華麗的大廳和藝廊，加上他特製的肖像，冀望藉由雄偉壯觀、奢侈華麗展示其統治的權力。國王亦然，「這些不同的物體和繪畫展示，用許多方式顯現了關於君主的一些特質—他的光輝燦爛、合法性、或英明睿智的統治。」<sup>13</sup>—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新共和政體就將國王收藏的藝術品充公，以人民為立權基礎的政府就將屬於國王的皇宮私人空間開放，將羅浮宮宣佈成為一個公共的、屬於人民的博物館，並且免費開放給所有人。

「法國大革命促使博物館公共化，開始開放社會大眾進入博物館，這象徵傳統權力—包括政治、知識、文化、詮釋—隨之移轉至民間。兩百餘年以來，博物館就在公共化、民主化、社區化的道路上前進，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構成之一。演變至今日，以當代西歐、北歐各國博物館為例，公立博物館提供民眾服務被視為公民權(citizenship)之一，揚棄以往分配、指派知識與文化的角色，成為傳承人類文化遺產的重要機構，將過去帝王與貴族的財富與地位轉化為全體國民的精神象徵。」<sup>14</sup>

公民權的理念雖然促使博物館的場域空間開放，但是以菁英份子所掌握的博物館文化場域而言，他們對於空間的控制與階級意識的鑿痕仍然相當明顯，一八六六年成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大多數的時間是收費的，而且在剛開放的前二十年，星期天是關閉的，當時廣大的通俗大眾和政治需求的團體極力呼籲在週日開放，因為絕大多數的上班族與勞工都在星期天才有空。這顯示了擁有使用博物館空間的平等權，並不能表示每個人在博物館的政治權力、接受教育等方面是平等的。

表面上博物館是大眾的文化財，但是實際上還是落在管理委員會，或是政府主管機關上頭，菁英

<sup>12</sup> 吳岱融，「博物館界的文化霸權」，建築雜誌，第一一四卷，第六期，第79-80頁(2007)。

<sup>13</sup> 同註1，第45頁。

<sup>14</sup> 蔡旺洲，「博物館做為公民權：建構當代博物館發展之思考」，疆界／將屆：2004年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新竹(2004)。



份子對於自認為屬於他們的博物館空間場域的控制欲與掌握方式可以多元，但是對於其他階級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一八九一年第一個開放的星期天出現的貧窮大眾，很快就消失了，而美術館的確也很快地又回到『可尊敬階級』的專屬空間。對藝匠所做的教育課程很快就停辦了，而關於上流社會主題的演講如蕾絲和紡織則持續進行。美術館學到了它可以在大體上毋需在排他性的空靈之氣做太多的讓步，而依然在外貌上顯得是在服務大眾。」<sup>15</sup> 現在博物館開放空間情況和過去相比較，可知這一百多年來，人類爲了這個文明的產物，爭取了多少應有的權利。

這是博物館的錯嗎？博物館沒有錯，只不過是擁有文化霸權的菁英份子利用了人類文明所創造出來的博物館場域，以鞏固他們這個地位團體的勢力範圍而已。「文化霸權的出現，將導致社會對其他弱勢團體的排他性；歷史的書寫將成爲掌握文化霸權的優勢團體的獨白，正如同歷史總是圍繞著勝利者的豐功偉業。博物館作爲文化機構，自然在此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推介角色，滋養了優室團體並延續他們的權力。」<sup>16</sup>

空間的爭奪戰不斷地上演，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法國生態博物館運動，透過社區集體動員，徹底翻轉傳統的博物館運作模式，從下而上地建構屬於地方社會的博物館，可以視爲博物館參與式民主概念施行的極致範例；雖然生態博物館解放了博物館的空間，但是其「由下而上」的理念就種下了必然失敗的命運。歷經三代的生態博物館改革，仍然無法擺脫菁英份子所掌控的經濟資本，仍然無法脫離菁英份子掌控決策權力之文化霸權威力，但是，筆者相信空間的解放意識仍然持續在進行，只要有階級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就有衝突產生，也就會形成新的博物館場域。

## 二、詮釋權力衝突

博物館所收藏的、展覽的文物，都體現了個人或該地位團體的主觀選擇。一幅畫作，一件文物，

其生命有價值處就在於誕生之時，那是在當地的文化氛圍之下完成的；但是如果它們被置放在博物館，與本來的語境切斷，被當作偶像供奉起來，它所被創造出來的「權威性」，其實是博物館菁英份子主觀詮釋的結果。

誰可以詮釋文物？誰有這個權力，誰站在這個場域的決策核心？目前對於藝術史的詮釋還是掌控在西方藝術史家，從這樣的思維脈絡所規劃的展覽，使得人們依舊是通過西方文化價值的鏡頭來詮釋來自非西方文化的人造物品。博物館以藝術史的敘述開展了一個空間序列，這樣的敘事結構爲每一個作品或文物附予「人爲的」意義框架，而且這個框架內容是展覽決策者所關心的。例如一件紐西蘭毛利人的垂飾如果擺放在藝術博物館內，它會被賦予一種審美價值；但是如果放在毛利人的文化展示中心，他們可能會重視這件垂飾與祖先的聯繫關係。「德塞和湯瑪斯研究發現，在英國種族弱勢團體參觀博物館的主要障礙，在於他們認爲博物館內展示物件及呈現方式，並沒有反映出黑人與南亞族裔對於英國社會的貢獻。」<sup>17</sup>

「博物館通常對本土的精神信仰持不敬態度。在一些傳統中，人們認爲照片會俘虜人的靈魂。但是，博物館往往將本土人民的照片作爲數據、插圖，甚至是它們的圖片館的組成部份，不經過他或她的同意就賣著他們的肖像。在立體模型展示中，頭骨和骨骼常常被擺放在蠟像模型周圍，用來暗示達爾文的種族類型學。人相學被詮釋爲道德性質的證據，表明土著居民是劣等的。有時，甚至是在世的人都被作爲人種學的標本來加以展覽。」<sup>18</sup>

「如果將文化視爲型塑意識形態以及文化認

<sup>17</sup> Desai, P and Thomas, A., *Cultural Diversity: Attitudes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towards museums and galleries*. BMRB. commissioned by 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1998).摘錄自 Elizabeth Hill, Catherine O'Sullivan, Terry O'Sullivan 著，林潔盈譯，如何開發藝術市場，五觀藝術管理，台北市，第 78 頁(2004)。

<sup>18</sup> Marstine, Janet 著，錢春霞等譯，新博物館理論與實踐導論，江蘇美術出版社，南京，第 18 頁(2008)。

<sup>15</sup> 同註 1，第 107 頁。

<sup>16</sup> 同註 12，第 80 頁。



同的柔性權力，則博物館無庸置疑是此權力角逐的場域，在這個文化角逐的場域當中沒有永遠的贏家，勝出的一方絕多是政治正確的文化論述。二十世紀初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以及南通博物苑，其成立動機均將『政治正確』的論述與知識，透過物件與文字的耙梳加以具體化。透過展示的開放，觀眾得以接收到這些『被視覺化的意識形態』，在觀看的過程中，博物館就成功地將主流價值與文化信仰移轉到觀眾身上，博物館成爲國家機器的宣傳工具，鍛造意識形態，完成身分認同的確立。」<sup>19</sup>

除了強勢文化詮釋的場域衝突之外，還有因性別因素而造成的場域衝突，那就是以男性的觀點詮釋藝術史，更甚者幾乎以男性的立場看待女性，或是以男性的霸權立場看待女性，以展示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畢卡索畫作「亞維農姑娘」爲例，這一幅被認定爲現代繪畫重要作品的表現方式，竟然是五位女人赤裸裸地攤開，如果是比較有「女性主義」意識的女人，當她走進這個男人們所塑造的展覽空間裡面，她會不會覺得受到歧視？從畢卡索對這幅畫的習作到完成的作品，右下角的人物整個抽離轉向，原本是蹲著張開腿展示陰部，但完成的作品卻面對觀眾，「畢卡索所揭開的關於女人的奧秘也是一個歷史的教訓。在完成的作品中，女人在風格上被區隔得讓觀者知道，他並非僅在觀看現在的妓女，而是回到了遠古和初民的時代，以『黑暗非洲』的藝術和代表西方文明源起的作品(埃及和伊比利的)所形成的一個光譜。於是畢卡索以藝術史來說明他的論點：震懾人的女神、可怕的女巫、和淫蕩的娼妓其實是一個同樣永恆生物的不同面貌，她是引誘人的、強制和自趨墮落的、支配和沒有能力的。」<sup>20</sup>

這樣的一種以藝術創作爲名的男性優勢權力表現，以男性觀點所編列的藝術史，以及所塑造的展覽空間，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屬於男人世界的美術館。「但是在永久藏品展覽和調查展覽中，原有的按編年史組織的展覽最近開始退位，取而代之的是

按主題排列的展覽，這爲解釋一個展品的展出提供了新的標準。」<sup>21</sup>正視這個因性別權力所產生的場域衝突，就可以正視博物館的收藏政策具有不完整的、偏頗的導向，透過女性主義者場域的「進逼」與衝突抗議，藝術史在性別與流派之間的關係就重啓調查，一個沒有性別歧視的展覽空間，是值得做的，只不過，我們如何掙脫數百年來以男性觀點爲主的藝術思想？重要的是，我們自身要有這樣的覺醒，所以，一場充滿矛盾的場域衝突，很可能就會發生在我們自己的思維內。

### 三、文化與合法性的衝突

博物館的誕生如果是起因於強權征戰掠奪的文物，因炫耀其戰利品而形成的展示空間的話，這個因人類「文明」而創造的場域，註定是一個衝突不斷、權力拉鋸的戰場。

19世紀初，英國埃爾金伯爵出使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希臘當時是由土耳其統治，埃爾金藉口與土耳其蘇丹的良好關係，將雅典帕德嫩神廟的大理石建築裝飾及石雕砍下並運回英國。之後他以35,000鎊轉賣給英政府，現陳列於大英博物館，埃爾金石雕(Elgin Marbles)成爲該館最具代表性展品之一。大英博物館拒絕歸還於希臘，並聲稱這是「搶救」，以避免希臘可能因爲忽視、地震和汙染而造成損傷。「實際的情況是，埃爾金石雕已成爲英國傳統的一部份，如同它本身是希臘文化的一部份。正如Timothy Webb所說，它們開始將英國展示爲古代雅典民主的繼承者，借此英國使自己的殖民和控制他國人民的政治決策合理化。」<sup>22</sup>可見，博物館也是展現文化霸權的場域，博物館本身可以擁有文物的詮釋權和傳播權，同時也可以構建一個民族的身份，並使其合法化。台灣的古宮情況亦然，從大陸輾轉運來的國寶古物，特別建造一個神似北京紫京城的建築，所要昭示的也是一個中華民族正統的代表意義。

藉著歷史文物的擁有用以代表文化的傳承或是統治正統，英國的說詞很難令人信服，但是這就

<sup>19</sup> 同註 12，第 79 頁。

<sup>20</sup> 同註 1，第 213 頁。

<sup>21</sup> 同註 18，第 84 頁。

<sup>22</sup> Ibid，第 2 頁。





是衝突理論所描述的強勢團體之宰制一方擁有發言權和決定權一樣，縱然博物館的成立比一家麵包店還不具正當性，麵包店的老闆可以說店裡面的設備與財貨都是他掙錢來的，正當而合法地擁有；但是有些博物館無法說出這樣的話，他們只能用「搶救」，或是幸好他們代為保管，否則該文物在原出產國不見得會留存等語，一個博物館內所展示的任何一件文物，其實正在進行一場文化詮釋權的場域競爭。

如果把布迪厄的資本觀念「國際化」的話，埃爾金石雕顯然已經成了英國擁有的象徵資本與文化資本，與具有掠奪他國文物相同情況的博物館串連，這些坐擁雄厚文化資本的博物館就可以利用參觀的觀眾與借展等行為，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並再利用經濟資本投資藝術評論家與媒體宣傳，為其「文化正統與正當性」辯護，整個資源網絡的形成與繁衍，就構成了強勢的文化詮釋權。

「博物館具有文化美容的神效，使博物館成為文化資本的爭鬥場域，企業、基金會、大眾媒體等陸續在博物館舞臺取得合法發聲位置，正如布迪厄理論透露：居於支配地位的博物館，通過大型展示的象徵(展示語言、文化內容與器物)得以建立其支配權(hegemony)。」<sup>23</sup>

所以，在博物館場域裡面，知識系統是權力菁英的意識型態；在國際博物館場域競爭上，文化霸權竟然是藉由「他者」的建構，而使得自我的存在與傳承合理化，即使是不合法的存在，只要他擁有文化詮釋權，他就是「事實與真理」。

## 伍、博物館的經濟脆弱性因素

背負著文化傳承任務的博物館，表面散發著文化光環的博物館，其實在經濟面而言是很脆弱的；博物館本身雖是大眾的文化財，但是博物館實際掌握者是管理委員會，或本文所稱的菁英份子，可以控制博物館空間場域，但是即便如此，因為博物館

經濟因素的脆弱，必須仰賴權力更為龐大的政府部門的資金挹注，因此博物館的掌控權力又往上推向資金挹注者，無論是政府部門或民間捐贈者。

自古以來，絕大多數的博物館幾乎無法自力更生，無法以每年的門票收入達到損益平衡點，以我國故宮為例，每年參觀人數超過 200 萬人，其門票收入仍無法支付營運費用，絕大多數的博物館每年的營運與蒐藏經費都必須仰賴政府的挹注或私人捐獻，經濟的權力操之於人，文化霸權、各式權力很自然就會在博物館孳生。

藝術收藏者會將美術館視為一個可被接受的紀念形式，甚至是一個替代傳統喪葬場所的選擇，在倫敦市南方的都威卻畫廊(Dulwich Picture Gallery)即是一例，把陵寢和畫廊混合成為一個儀式空間。追求一個永恆之所是某些收藏家的夢想，蓋提花了一千七百萬美元建造皇宮似的美術館，就是希望可以永遠享受到遊客對他的奉承，「蓋提明確表示，他希望來到博物館的遊客產生一種親臨一位傳奇性人物宮殿的感覺。」<sup>24</sup>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的里曼(Robert Lehman)廂房也是一例，在建物之內是一個小丘，看起來像地下的房間，在寬廣的走道漸漸環繞下沉有兩層樓深的莊園，然後在整個地基逐漸升起一個大的玻璃帷幕金字塔，整個建築有古典埃及墳墓的意味，「當在此處工作的警衛開玩笑地說，里曼是葬在這些房間的某處時，就不那麼讓人覺得奇怪了。不論是否有遺骸，對於里曼房間的造訪，是一個也可以被視為是憑弔一個常眠地下逝者的儀式。」<sup>25</sup>

捐贈者的經濟實力或政黨的政治權力可以擁有主導博物館陳設內容的權力，兩個以上的「準團體」(quasi-groups)使博物館成為衝突場域，達倫多夫指出，「社會的支配性價值是由能夠把握或操縱其權力的策略性位置的個人與團體所設定。因此，決定角色與位置以及社會報酬與資源如何分配的，乃是社會中權力的分配，而非社會的需求或共

<sup>23</sup> 黃素雲，「文化流動及其商品化：兩座博物館的『羅浮宮埃及展』之研究」，博物館學季刊，第十九卷，第一期，第 52 頁(2005)。

<sup>24</sup> 同註 1，第 150 頁。

<sup>25</sup> 同註 1，第 167 頁。



通價值。」<sup>26</sup>

博物館在經濟地位上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自身並無任何主導策略與走向的能力，遂成了各方勢力爭奪的場域，博物館也成了這些決策主導者的操作工具，這個情況在國內也時有發生，以國內最大的博物館—故宮為例即可說明。

杜正勝擔任院長一年半後，又在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博物館的專業主義—2001年博物館館長論壇》發表論文〈藝術、政治與博物館〉，文章指出，故宮是全世界政治符號最多的博物館，應回歸藝術本質，才能「正本清源」。這個論點本來沒有錯，但他通篇的討論，卻恰恰充滿著濃濃的政治味，而什麼才是故宮文物的藝術本質，也未著一詞。他一方面說「我經營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基本態度首先是『去政治化』，回歸於藝術的本質」<sup>27</sup>，另一方面卻又主張「當台灣主體意識覺醒、確立時，國立故宮博物院該如何在這塊土地上重新立足，如何讓這塊土地的子民接受...這是博物館的藝術任務之一，當然帶有廣義的政治性任務。」<sup>28</sup>顯然自相矛盾。他在註釋 28 當中，寫著：「從革命或獨立的立場來說，故宮藏品被認定為專制剝削或外來政權的標識，也不能說是無理取鬧。」在此其動機已昭然若揭。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其實就是「去中國化」，要將中華文化這個因子，從故宮文物裡硬生生地剝除。<sup>29</sup>

收藏著清代皇室收藏品的故宮，在國民黨與民進黨政府的政策操作下，博物館可以不必有文化傳承的使命，博物館也可以沾滿政治味。

這樣的政治操作鑿痕在故宮南院的設立上也相當明顯，「2002年初，杜正勝又提出在南部設故宮分院的計畫。其理由一為原有展示空間不足，

另一則為『南北文化均衡』。此計畫引起不少反對聲浪，但中南部許多縣市長卻極力爭取。2003年決定設在嘉義太保之後，杜正勝卻改口說要以搜集亞洲文物為主，頗令人錯愕。目前還有多少有價值的亞洲文物可以收藏，很值得懷疑。故宮南院是否會變成另一座『蚊物館』，並非毫無疑慮。他雖然口口聲聲說亞洲文物也包括中國文物，但故宮不再搜集中國古物，卻是事實。總統大選期間，嘉義地區到處飄著書寫類似『阿扁落選，故宮南院興建無望』字眼的競選旗幟。由此更加證明，故宮南院的興建，實與文化無關，而不過是去中國化、鞏固南部票源的政治動作而已。」<sup>30</sup>

民進黨執政時期對於故宮南院的決定已有不少爭議，但政黨執政輪替後，爭議依然不斷，翁金珠委員即直言「故宮南院的設立在民進黨政府時期原已獲得各界共識，定位為『亞洲文化藝術園區』，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周院長上任後，先說要設『西遊記主題樂園』，日前又說要改為『花卉文化博物館』，在與嘉義縣長商談後又說會再次評估南院定位。故宮南院的定位如此一日三變可說是馬政府之冠，政府的反覆與說詞不一均顯示周院長對於故宮南院的不用心，竟單以部分人士的一面之詞就改變如此重大的決策，完全不顧地方聲音。」<sup>31</sup>

因為政治勢力的更迭，博物館的定位可以恣意改變；因為博物館在經濟自主方面的脆弱性，使得文化傳承的延續與一致性受到權力團體嚴酷的挑戰，看似平靜無憂的博物館展覽會場，其實在後台是充滿權力折衝與交戰的場域。

## 陸、結語

翻開城市的文化地圖，博物館、美術館總是擁有一種「靜謐的吸引力」，很容易成為該城市的文化地標，這個靜態的建築物及展覽文物，其表象是一波波參觀的人潮，為著一幅心儀很久的作品前來

<sup>26</sup> 同註 3，第 34 頁。

<sup>27</sup> 杜正勝，「藝術、政治與博物館」，博物館的專業主義—2001年博物館館長論壇，台北，第 12 頁(2001)。

<sup>28</sup> Ibid，第 14 頁。

<sup>29</sup> 本段內文取自劉新圓，「意識型態斷喪文化教育，『罄竹難書』」，國政分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EC/095/EC-B-095-010.htm>(2006)

<sup>30</sup> 同註 29。

<sup>31</sup> 2009年3月30日翁金珠委員提出的書面質詢稿 <http://blog.roodo.com/wongchinchu/archives/8716607.html>



感受在真跡前面的悸動;但是其背後卻暗藏著各股價值觀與文化的矛盾衝突,甚而為了爭奪這個場域的發言權,而展開或明或暗的鬥爭。

傅柯(Michel Foucault)提醒我們:權力主要不是壓抑,而是同化。有時重要的不是說了什麼,而是誰在說。<sup>32</sup>「知識就是權力,博物館透過知識形塑與傳遞的機制鞏固權力。在不知覺中,博物館對大眾進『同化』,大眾之於博物館的『殿堂』心態也強化了這種無形的同化活動,大眾在不知覺中臣服於博物館傳遞的知識,因為所接收的知識是由『博物館』所傳輸。」<sup>33</sup>正如傅柯所言:「知識也是一個空間,在其中,主體也許會採取一個立場地位,並且言及在他的話語中會處理到的客體...。知識也是聲明相互連結及依屬的一個場域,在其中,觀念出現,被定義、運用及轉變。」<sup>34</sup>

世界上並沒有『博物館本身』的事。博物館的存在是思想性的,它融合於文字及設施中。這個思想並不是結束了,而是逐漸在形成,並循序漸進發展為一個自承體系的歷史。<sup>35</sup>所以,博物館的問題

本身並不在於機構本身,其答案可能在機構之外;誰若爭取到博物館場域的主導權,誰就擁有合法的文化霸權,無論是文化詮釋權力、性別與空間塑造的權力等,都具有合法的排他性,從而建立從屬關係的地位團體,利用這個文化與社會資本再獲得其他的利益。

透過衝突理論與場域的眼睛,我們就可以認清,即使博物館的存在號稱是國家文化的保存所,館長的任命權其實是一個政治角力的場所;博物館的文物收藏政策關係到收藏的標地物及展覽方向,它其實也是國家之間文化傳播權力的較勁場域。我們不必太過期待博物館能與該所在地的社區人民互動有多少,對於該地區文化「長期記憶」之保存有否貢獻,因為如果沒有利益交換或衝突,博物館不會主動去解決的。

社會是流動的,社會也是各種權力不斷折衝的動態平衡體系,我們卻可以期待博物館面對女性主義的質疑,面對少數族裔或其他國家文化人士抗議扭曲形象的聲浪,面對文物宗主國要求歸還的壓力,面對國家文化政策與博物館既定政策若有衝突之時,面對文物捐贈大戶要求另闢一間個人展覽專室之時,以上種種的「他者」勢力強大時所發出的抗議聲浪,使博物館的功能更臻於真實,更貼近社會大眾的需求。

每一件事情都是至少兩股勢力的抗衡與鬥爭,我們可以說博物館的事是很政治性的,展開所有衝突內容之後,博物館也顯現出它的「脆弱性」,仔細分析博物館成立的要件,其實博物館沒有多少自主性,當它的財務支援、政治權力支援、民眾輿論支持喪失之時,博物館的脆弱性就明顯嶄露出來,這可能就是博物館衝突不斷的成因之一,一個人類文明創造出來的產品,最終,人類自己還是要想辦法解決的。

對於博物館這個人類文明創造的產物,面對各種形式的衝突與調適,要達到「雙贏」的願景雖然有些難度,但是只要正視這個現象,意見對立的兩造之立場差距是可以調整的,形成衝突的場域之不平等地位也可以謀求「動態性」的平衡。

從博物館財務支援論點切入,這個造成衝突點

- <sup>32</sup> Dreyfus, H. L. and Rabinow, P.,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1982).摘錄自劉婉珍,「透視博物館劇場:博物館知識建構的真實世界」,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慶祝漢寶德館長七秩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第189頁(2005)。
- <sup>33</sup> 劉婉珍,「透視博物館劇場:博物館知識建構的真實世界」,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慶祝漢寶德館長七秩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第189-190頁(2005)。
- <sup>34</sup>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1966). (Translated by A. Sherid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摘錄自劉婉珍,「透視博物館劇場:博物館知識建構的真實世界」,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慶祝漢寶德館長七秩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第190頁(2005)。
- <sup>35</sup> Hooper-Greenhill, E., *Museum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1992), cited from Waidacher, F., *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Museologie*, Wien: Osterreichisches Theater Museum(1993). 摘錄自張譽騰,「博物館學的源流與當代意義」,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慶祝漢寶德館長七秩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第103頁(2005)。



主要因素為例，在政府挹注資金與民間捐獻之間，是否可以設立財團法人的形式，制定博物館運作的法律，確定博物館營運資金的來源，政府固定補助與博物館自籌財源之比例；設立各方勢力「權勢平衡」的董事會組織，可以有限度地容許有政治權力任免的人，以及有經濟財力資助博物館的人，在博物館內「有限度」地滿足其私人或其家族之名聲、典藏等慾望。當博物館的財務資金來源無虞，透過各方人士所組成的董事會之集體領導，不僅可以讓博物館經營獲得最大的自主權，也可以滿足少數人的私欲，雖然仍在存在不平等的現象，但是從過去的博物館衝突史來說，縮小立場差距的成果，就是博物館經營邁向「平等」的一大進步。

另從博物館展示與詮釋論點來看，我們可視每一個展覽就像是一個對話，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對話的機制不僅是策展人與觀眾的對話，而是展覽主題的訴求對象與對立方的對話；對話的形式不是靜態的展示，而是動態的研討會、發表會方式，透

過展覽議題的引導，誘發意見與立場對立的兩造或多方族群討論與辯論，提出各自觀點的證據及論文，雖然無法獲得一致的共識，但是充份的溝通就是調適不平等地位的必要手段。博物館展覽的內容雖然策劃多時，但是一旦公開展示，就是面對不特定的第三者，其間或有對某特定族群不公允之處，博物館或可保留一個「動態」可調整的展示空間，在各團體討論發表對話激辯之後，能有一個提出不同見解與證據的發表空間，經過一定程序的展覽審查，也可以在既有的展覽會場內，提出另一種觀點，提供給觀眾一個更為寬廣的思考空間。

由以上兩種論點切入的解決方式可知，博物館的衝突現象其實是可以調適的，但是前提是「我們」想要去改變，「我們」想要去爭取，「我們」不必怕引起衝突，正面檢視衝突的引爆點與不平等的立場差距，就是解決與調適衝突的第一步，也是引領博物館經營更符合人類文明任務需求的重要一步。



# Observing the Phenomenon of Power Struggles in Museum Field from Viewpoint of Conflict Theory

**Lai Yuan**

Part-time Lecturer,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 Abstract

Through conflict theory of sociology a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field of Pierre Bourdieu, this text will dissect clearly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 field and cultural capital, and untie every conflict point of museum one by one; such as power struggles which the space show molds, conflict of an annotation for culture and gender, and conflict of legitimacy for exhibits source, etc. The text explains the true condition of this legal culture hegemony in the museum and highlights museum's own fragility too, so that readers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museum, which puts on the coat of culture, is in fact a field that hide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and is the projec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al contradiction too. This text hopes to pass the dissection of the conflict theory and so can stimulate readers to consider a win-win strategy, in order to make the operation of the museum press close to the people's demand even more

**Key words: Museum, Conflict Theory, Field, Cultural Capital.**

---

Corresponding author: 10F., No. 154-5, Jilin Rd., Luzhu Shiang, Taoyuan County, Taiwan (R.O.C.)  
Zip Code: 33850  
Tel: +886-928861212  
Fax: +886-2-2960-1593  
E-mail: leoyuan@ms4.hinet.net

